

# 医院里的“总统套房”，谁在住？

时下是一个消费的年代，如果你有足够的钱，大多数欲望和需求都会被逐利的市场魔变得舒舒服服，都可以“VIP”化，享受到与众不同的高端服务。

“VIP”客户，最早是移动电话公司、俱乐部、银行等推出的贵宾服务，是一种时尚的称呼。在这种潮流冲击下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公立医院也开始大摇大摆地走上了“VIP路线”。而医院所谓的“VIP病房”，在医疗服务项目中规范的名称应是“贵宾病房”，又称“贵宾病房”。

近日有媒体报道，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特需病房区正式投入使用，其中两套超200平方米的超豪华“VIP高级病房”引人注目。除去高昂的床位费外，完善的配套设施、可“点”专家诊疗等服务让其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总统套房”。在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的今天，公众如何看待“VIP病房”？它是为了遵循“优价优质”的市场准则吗？

## 医院设立“VIP病房”引发争议

近年，医院的各种“VIP服务”、“VIP病房”如雨春笋般不断向外推广。比如入院挂号，病人可以直接预约，随到随接，随接随治；健康体检，病人可以与旅游相结合，定人、定时、定接送；住院治疗，病人可以点名手术，可以要求特别护理，可以家属陪床，可以点菜



某医院设立的VIP门诊（资料图片）

专送，可以拥有家庭式病房，自己做饭等相关“VIP服务”。这种当下普遍存在的公立医院“VIP服务”，引起群众热议，各方观点不尽相同。

一些人认为，应该理性看待“VIP病房”的存在。从市场的需求来看，“VIP病房”的存在可以满足部分有需求患者的需求，是一种正常的市场供需；从医院盈利的角度看，在当今医疗体制下，医院作为市场主体，有权利追逐自身的利益。

反对者则认为，“VIP病房”的存在，尤其在现阶段不断涌现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，造成一定的危害：一是容易造成部分就医者的不解，让他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认为医院将本应一视同仁面向全体民众的公共资源优先给了少数人，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；二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利益，“VIP病房”数量的不断增加也会造成“VIP病房”资源紧张，引发新的矛盾和不满。

有网友评论表示：奢华医疗服务不应该占用公共卫生资源。公立医院主要为大众服务，富人要想得到快捷、优质的服务，就应多花钱去私立医院。与其在公立医院设立高级病房，不如让私立医院加快发展。

全国政协委员冯世烈曾在今年“两会”上提出，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，并不是高级饭店，设“VIP病房”完全没有必要。

“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”是我国新的医疗卫生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。目前广大群众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，“VIP病房”实际上是将患者划分等级，背离了公共医疗机构的服务宗旨。

## 医院“特需医疗服务”：遵循“优价优质”的市场准则？

据报载，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部的4楼为高级病房区。该医院高级病房区分3种规格，分别是单人房、一房一厅、“VIP高级套房”。这些高级病房共有22套（间），日床位费从100多元至800元不等。其中最豪华的“VIP高级套房”每天床位费800元，拥有一间可容纳20人的会议室，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。

这么高级的病房为谁服务？院工作人员称，特需病房收治对住院环境要求较高的各专科病人，只要病人经济条件允许，就可以入住。当然提供优质服务，服务高客户也只是医院在满足不同阶层群体的需要，为患者



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部的特需病房区环境优美

提供个性化服务。

有市民就认为，这种做法表面上遵循了“优价优质”的市场准则，实质是将本应一视同仁面向全体民众的公共资源给了少数人。该医院门诊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治医师表示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必要的。现在各大医院竞争都很激烈，不仅要和私立医院争夺消费者，公立医院之间也面临着利益竞争，追求利益在所难免。

眼下，到大医院看门诊“一号难求”、住院“一床难求”已不是什么新鲜现象。一边是医院普通病区走廊过道加满病床，一边是医院“VIP病房”大量闲置。有的专家教授一星期只看半天病，市民为挂个专家号，要摸黑起早赶往医院排队。医院推出“VIP”挂号，可让“VIP”患者随到随看。市民拿着号望穿秋水排着队，待快到自己时却被“VIP”插队，心情可想而知。

在目前公立医院医疗费普遍投入有限的情况下，一些公立医院办“VIP病房”成风，这种“优价优质”的行为导致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设计被架空。因为，“VIP病房”打破了公共医疗卫生的公平，尤其是“VIP病房”抢占了

其他人的医疗资源。试问：公立医院不应该是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地方吗？这种不顾大多数群众看病难的痛苦，而盯着少数高收入者的钱包开展经营的做法看起来不太合适。

## 医院“VIP病房”之风不可长

在目前大医院人满为患，群众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突出的今天，医院为了满足不同社会层次人群的特殊要求，将病房划成贵宾病房和普通病房，实际上将入院就医的病人划分成三六九等，明显背离公立医院服务大众的宗旨。

试想，当多名病人不得不挤在一个病房，而有钱人却享受豪华病房套间时；当大量急需住院治疗的病人因为床位紧张无法及时入院，而“VIP患者”却通过“绿色通道”享受便捷、全方位的医疗服务时；当疑难病患者经过长途跋涉赶到大城市还要为

挂一个专家号而长时间地排队，而高收入者却直接通过“VIP诊室”得到专家的治疗时；公立医院的“公”字还能得到充分体现吗？对于公立医院来说，为广大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是其基本职责，如果只盯着少数高收入者的钱包开展经营，就失去了公立医院的基本立场。

当前，公立医院的首要职责仍然是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，不能盲目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，必须坚持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不变。然而在目前医疗资源紧缺，百姓看病困难的情况下，公立医院不是想方设法方便患者看病，而是打起了经济利益的小算盘，这种行为是与当前“为群众提供安全、有效、方便、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，促进人人应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”的医改目标相悖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跨入富人行列，追求高物质、高享受、高消费……在这种情况下，出现贵宾或贵族现象，可以理解。但并不意味着有的行业都可以走市场化道路。像医疗服务本来就是一项社会公共品，让这项社会公共品价格物美，惠及百姓是政府的天职。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应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，满足广大群众最基本的医疗需求，解决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等一系列问题，而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终目标，这与政府主导的公益性背道而驰。因此，医院的贵宾或贵族之风不能长，政府机关应加强管理，公共医疗资源要一视同仁地面向全体民众，面向所有的老百姓，面向每一个病友！

据新华社



这里有绝对优质的服务！

# 新闻时评

## 高考录取只应追求看得见的公平

在今年的高考招生中，山东省首次试点将学生的“综合素质评价”纳入录取依据，试点院校临沂师范学院的投档考生中，有十几名考生由于“综合素质评价低”而被退档，而有的低分考生则因为“综合素质评价高”被录取。（8月30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据悉，山东省的办法，是由大学教授组成的专家录取组“认真审阅考生电子档案和综合素质评价信息，然后提出录取建议”。只是通过这些难见仁见智、表述或模糊的评价信息，便决定一个人是否应该被录取，显然有些轻率。

高校大多是培养专门人才的，就此而言，所谓的“综合素质”对一个专门人才的发展究竟会产生怎样的作用，很难加以预测。比如，一个人对文史哲均有涉猎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“综合素质”算高了吧，但这样的“综合素质”对其发展究竟是利是弊呢？试举一例请教：如果当年的陈景润在今日的山东参加高考，其“综合素质”算高算低？退一步说，就算“综合素质”对于高校招生确实非常重要，但高考

录取最好只追求“看得见的公平”，难以清楚计量的“综合素质”，远未达到可以纳入高考录取依据的时机。如果某些实现公平的手段是看不清、摸不准的，那怕有再多的“积极意义”和“正面作用”，也不应纳入普遍的制度之中。

应该说，当前高考录取中的许多乱象，都与未能坚持“看得见的公平”这一原则有关。譬如特长生加分政策、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制度，都本来是为了弥补招生制度的缺陷，但这些政策制度的实施过程却越来越显得事与愿违，乃至不公平性日益凸显。究其原因，就在于这些政策制度往往缺乏统一的标准，实施的随意性太强。

当然，并不是说高考要永远因循下去，终有一天“综合素质”是要被纳入录取依据的。但那一定要在高等教育资源极大丰富，高等教育健康竞争格局基本形成，各项社会监督制度基本成熟之后。在高考仍然是社会底层跻身上层的主要渠道的今天，高考的公平平决不能成为被折腾的“实验品”。

郭之纯

## 有一种金蝉脱壳叫“从善如流”

有些机关的作风，常常令人产生两种感叹：事发前，明知故犯的“牛气”令人愤慨；东窗事发后，从善如流的“效率”令人感慨。

武汉市民姚先生到江岸区房产局档案室查询自己的购房评估报告，复印8张纸共付费119元。经众多媒体曝光后，该房产管理局责成江岸区房产管理局向当事人赔礼道歉、退款，包括江岸区房产局在内的全市各区局都已停止此项收费。（据《长江日报》8月31日报道）

当初，姚先生花费119元才复印到《房地产交易课税价格结果报告单》等8张材料，江岸区房产局自称的收费标准是1元/平方米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江岸区房产局相关负责人坦言，其收费标准尚未获得物价部门批准。未经物价部门批准，擅自执行的收费标准是不合法的。其实，相关的法律规定，江岸区房产局肯定是清清楚楚。然而，明知故犯的江岸区房产局在收费的时候照样理直气壮，上门要求复印材料的普通群众肯定没办法讨价还价。

然而，这么牛气冲天的房产局，居然来了个

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！武汉市房产管理局召开紧急会议，责成江岸区房产管理局向当事人赔礼道歉、退款并停止收费，对全局收费项目和收费依据进行清查治理，这样神奇的大逆转，这样的从善如流，原因何在？原因在于，8月13日《长江日报》刊登了报道《复印8张纸收费119元》，并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、热评。

如果姚先生没有执拗地向报社反映，如果报社没有仗义执言地刊载，如果舆论反响没有波及全国，房产局还会这么自觉悔改吗？迫于舆论形势的压力，不与社会舆论对抗，在领导和主管部门形成关注和问责前匆匆把罪证“销毁”，是巧妙的“金蝉脱壳”之计。如此的高效，实为推卸责任的“伪善”。如此的高效，实为急于遮掩过失的仓促。

没有触及问题实质的“从善”只是暂时的表象，于此前的工作没有深入的反思，于此后的工作改进也不会有切实的借鉴。整治行政不作为、乱作为，宁可不要匆忙的高效，也要慢慢地查他个水落石出，免得匆匆地放过了不该放过的人和事。

许晓明

## 漫画：考生爸爸被“录取”

《广州日报》报道，家住广东江门新会区的小林是今年新会一中的高中应届毕业生，他的高考成绩达到本科线，早就收到了华南理工大学的正规录取通知书。可是，他的爸爸一把年纪了，并非考生，却竟然连续收到了11封来自各地的录取通知书，这些通知书都许诺奖学金、毕业后高工资、享受户口迁移和集团分房政策等优势条件……令人啼笑皆非。很明显，这些录取通知书都是冒牌的，考生和家长必须警惕这类诈骗行为。而相关监管部门则应主动出击，将这伙害人虫收入法网，使他们无法危害社会、祸害百姓。

吴之如 文画



刘洪波

## 补习风为何越扑越“疯”

日前，有媒体播出了成都10万学生暑假补习的报道。报道播出时，学生们这个无休假的假期已经接近尾声。报道的“延时”，有意也好，无意也好，使暑假补习能够“善始善终”地进行。是暑期补习只有成都没有治好，还是暑期补习已成惯例，没有了“新闻价值”，让人失去了谈论的兴趣？

世界各国的学校教育制度，都会设置相当长的寒暑假，这对于学生和教师的休息、调整必不可少。利用本该休息调整的假期进行补习，也许会参加补习的学生考得更好，甚至也能让人产生“时间利用有效”的感觉。但至少到目前为止，还没听说哪个国家，会为了学生“学得更多更好”而取消寒暑假。

对学生和家长来说，选择补习无可厚非，他们需要获得更高的分数。但教育的成功，

不在于考得更好，而在于收获国民素质、人格健全、人才创造力和求知的快乐。对整个社会而言，分数是无意义的。补习泛滥很可能导致科目分数替代素质、人格、创造力和快乐的倾向，它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支出，购买到的是一种负向的社会收益。因此，解决补习问题是一个教育管理问题，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。

报道中，有民办教育机构和专家都认为，民办教育机构举办补习班，符合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，而教育主管部门不许教师到补习班授课的禁令之所以难以奏效，其根本问题还在于高考指挥棒。这种看法不无道理。归根结底，市场对补习的旺盛需求，是由各式各样的考试所带动的。而反过来，补习的“繁荣”又可能导致这样的现象——教

育部门因为补习产生了“会解难题的好学生”而提高考试难度，否则不足以区分学生的高下。这样，补习与考试之间就形成了“良性循环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欲以行政命令扑灭补习之风，这就如同自己创造了一个市场，而又宣布这个市场不许存在。结果显而易见，那就是市场继续存在，而禁令不过是可以随时抓一两个“坏典型”的依据罢了。

因此，对于大规模的补习，我们需要思考的，不仅是现象本身，更是对教育目的的思考：我们培养的是“应试工具”，还是思考与创造的主体？国家举办教育的目的，决定国家教育考试制度；国家教育考试制度，决定教育评价的标准。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，需要怎样的未来，这些更根本、更长远的问题，恐怕就不单单是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考虑的事了。

刘洪波

## 当英雄韩寒败给偶像郭敬明

在这个文化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，一个写作者如果坚持将文化与商业绝缘，恐怕很难摆脱被遗忘的命运。当然，那些出版商也肯定不愿意让这种“文化的傲慢”来剥夺市场的利益。

现在，连韩寒这个少年得志的公众人物，也逃不出这样的市场定律。最近，在悄无声息的状态下，韩寒出版了散文集《可爱的洪水猛兽》。不过，这本书却遭遇了市场滑铁卢，原因就是韩寒不搞发布会，也不签约。为此，下游经销商与出版方不断逼迫韩寒，要他向市场妥协，进行活动宣传。否则，就让那些新书变成散落在暗角的盗版书。

韩寒这个离经叛道的自由青年，在欲说还休中，不得不脱下那件“文化英雄”的外衣，在自己的博客写道：“应出版商的要求，贴出最新的杂文集的封面。”谁都清楚，在这个网络时代，韩寒那个已拥有两亿六千万访问量博客的倒带，去让更多人的看清谁是真正的“文化英雄”，谁是虚幻的“文化偶像”。

于是，在最急迫的当下，总会上演一些文化的“英雄”被“偶像”击败的尴尬。比如，韩寒的“英雄傲慢”就在市场上彻底败给了郭敬明的“偶像殷勤”。在2008年作家富豪榜上，郭敬明以1100万收入再居榜首，而韩寒以170万跌到第18位。那些书商们都喜欢郭敬明这样市场活动的狂热分子，认为韩寒应该向郭敬明学习一下，多搞活动多签约。必须承认，韩寒具备比郭敬明更能成为青春偶像的气质。问题只是，韩寒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披着“文化英雄”的外衣，以特立独行的姿态，拒绝过度沦陷于市场投机的工作。

当韩寒的“英雄”败给郭敬明的“偶像”，那些消费着文化麦当劳的人们，恐怕并不知道，此时的市场也可能是很不可爱的“洪水猛兽”，会挟裹着“文化英雄”的那面破旧的旗帜，向不知名的下游流落。 单士兵